



城市的性质：城市理论的范围和局限性

Allen J. Scott, Michael Storper

► 引用此版本：

Allen J. Scott, Michael Storper. The Nature of Cities : The Scope and Limits of Urba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5, 39 (1), pp.1 - 15. Hal-02163265

HAL Id: hal-02163265

<https://hal-sciencespo.archives-ouvertes.fr/hal-02163265>

2019年6月24日提交

HAL是一个多学科的开放性档案，用于存放和传播科学研究文献，无论它们是否已出版。这些文件可能来自法国或国外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或来自公共或私人研究中心。

HAL多学科档案馆的目的是收集和传播来自法国或外国教育和研究机构、公共或私人实验室的科学研究文件，无论是否公开。

— 城市世界

— 城市的本质：城市理论的范围和局限性

阿伦-J-斯科特和迈克尔-斯托尔珀

摘要

近几十年来，关于城市理论的范围和内容的辩论越来越多。争论的特点是对城市性质的许多不同主张，包括宣布城市是一个不连贯的概念，城市社会不亚于整个现代社会，城市规模不能再与全球规模分开，以及迄今为止的城市理论因其几乎完全集中于全球北方的城市而被严重削弱。本文对类似的说法进行了一些澄清。所有的城市都可以用一个理论框架来理解，这个框架结合了两个主要的过程，即集聚/极化的动态，以及相关的地点、土地使用和人类互动关系的展开。这个框架也可以用来识别许多不同种类的城市，并将城市现象与社会现实的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因此，讨论确定了所有城市的共同维度，一方面没有夸大城市理论的范围，另一方面也没有断言每个城市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特例。

不要太急于找到城市的定义；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有很多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

乔治-佩雷克（1974: 119）

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上述引文呼应了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城市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复杂，如此缺乏易于识别的边界，以至于任何试图定义其基本特征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城市研究，大量关于城市性质的不同说法争相涌现。尽管有这样的混乱，我们大多数人在处理日常命题时并不犹豫，比如说，现在全球各地的城市都在快速发展，或者城市化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地向前推进。事实上，城市化是我们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以至于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学术议程不断涌现，甚至在城市究竟应该如何被概念化和研究方面的分歧也在不断增加。

我们感谢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E. Smith）和三位匿名的IJURR审稿人，他们的意见使我们对本文的论点做出了重大改进。

1 不要急于给城市下定义，它太大了，你很有可能会弄错”。

我们如何理解并希望指出解决这些紧张关系的途径？任何这样的解决方案对于目前普遍存在的城市分析方法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困难的问题，任何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尝试都必须要有的一些复杂的理论和经验上的操作。在下一节中，我们通过强调过去几十年来在城市研究发展的不同阶段成为辩论焦点的一些观点，为这一尝试做了铺垫。随后的讨论将继续进行，以确定城市分析的一些基本共同标准，并描述其对进一步研究的影响。

城市理论的趋势

在二十世纪的早期和中期，一种基于芝加哥城市社会学学派工作的正统观念可以说是城市分析中占了上风。Park 等人（1925年）、Wirth（1938年）和Zorbaugh（1929年）等学者的经典论述，主要是将城市作为社会上有差异的街区的集合体，与相关的心理和行为一起陷入生态进步和继承的动态中。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学派的观点开始受到强烈的批评，特别是Castells（1968），他认为在城市社会学的旗帜下研究的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都市问题，因为最终它们只是关于整个社会的问题。卡斯特尔斯（1972年）后来将芝加哥学派的工作一概否定，认为其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掩盖了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组织框架的更根本的性质。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初，芝加哥学派的主要痕迹正在被一股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方法所扫除。Castells和其他分析家，如Lefebvre（1970）和Harvey（1973），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坚持城市作为阶级斗争的剧院的概念，以土地市场为中心，作为向上分配财富的机器，以及来自下面的关于城市空间和资源的公民权利的相关政治主张。此外，在桑德斯（Saunders，1981）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卡斯特尔斯关于城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论点的回声，他甚至认为，城市本身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分析对象，而只是一个任意的地理容器，包含了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现象。

1980年代带来了关于城市和城市化的几个主要的新论点。这里应该特别重视三个主要的调查方向。首先，女权主义者如Massey（1991）和McDowell（1983）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专注于城市的性别层面，而其他学者则恢复了对城市背景下的民族、种族和阶级的长期兴趣（例如，见Jackson，1989；Waldinger和Bozorgmehr，1996）。这两个研究方向都提供了对社区发展和迁移的见解，以及对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在城市中的空间分类的不同方式的见解。其次，在Friedmann和Wolff（1982）以及Sassen（1991）等人关于全球城市体系的兴起和全球化对城市内部结构的影响的工作中，形成了一个迅速发展的研究方向。第三种主要趋势是围绕着Brenner（1999）、Cochrane（2006）、Harvey（2007；2012）、Jessop（1997）等人对城市政治和治理的旧有关注进行重新概念化。后面这些文献主要关注政治治理规模的变化--从城市到国家再到全球--以及新自由主义对这一过程的支配。目前，所有这些不同的城市调查路线都在继续发展和壮大。

到了千年之交，可以发现关于城市的理论感觉又有了一些重要的转变，其中一些现在已经变得相当有影响力。其中一个转变是对城市理论进行强烈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特别是，Robinson（2006）和Roy（2011a）认为，许多20世纪的

世纪的城市理论，其根基绝大部分在全球北方，存在知识上的狭隘性，因此其对普遍性的主张必须受到质疑。在这方面，Robinson（2011）为她所谓的“比较姿态”提供了有力的辩护，认为它是构建城市知识和避免先验理论化危险的基础，特别是当它是基于全球北方的有限城市样本时。Roy和Ong（2011）以这些出发点为基础，呼吁将城市“世界化”，这意味着努力将更多城市纳入调查视野，并承认城市和全球之间的反思关系。在某些方面，这些最近的后殖民方法呼应了早期作家的作品，如AbuLughod（1965）、Jacobs（1998）和King（1976），他们以一种相当直白的方式定义后殖民城市主义，即由殖民主义的经验形成的城市状况。在后殖民时期，这种早期的城市发展形式随后与由国家 and 全球政治和进程形成的后续发展经验相融合或互动。但在早期的工作中，并没有声称对后殖民时期城市的考虑需要拒绝现有的城市理论或发展替代的理论化形式。

最近的第二个转变是与一些学者的第一个转变相重叠的，它要求以行为网络理论和组合理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研究方法。这些方法通常通过构建人类和非人类的城市关系的根茎网络来进行（例如，见Ong和Collier，2004；Robinson，2004；Sassen，2008；Farias和Bender，2010；McFarlane，2010；2011；Rankin，2011）。这第二条路线的工作试图通过构建以强烈的实质性特殊性为标志的城市情况的复杂描述来建立城市或领土的形象（参见Wachsmuth等人，2011）。这项工作避免了先验的理论抽象，尽管它有时确实试图通过构建基于它所描述的表征之间的关联的类型学来进行概括（例如，见Roy和Ong，2011）。尽管如此，这项工作的总体基调还是被Amin和Graham（1997）所描述的具有多样性和特殊性的“普通城市”的概念所捕获，它非常强调个别城市场所的特殊性。

对20世纪初至今的文献进行的这个简短的抽样调查表明，城市研究在概念框架、问题和研究方法上很容易出现普遍的、不断扩大的不连续和不一致现象。鉴于城市化原因的复杂性和城市本身的多面性，这并不完全令人惊讶。同样，“城市问题”，也就是与政治目标或政策关注相关的研究，似乎随着每一代新的城市学者的出现而改变了它的位置。这种碎片化的感觉进一步反映在不断变化的关键词上，这些关键词在文献中流传，试图捕捉城市发展的特定空间或时间结点。像俘虏城市、被操纵的城市、后现代城市、叛乱城市、消费城市、作为娱乐机器的城市、收容所城市、新自由主义城市、支离破碎的城市、双重城市、数字城市、全球城市和创意城市等术语，都是这些观察词的熟悉例子。

我们将在以后的讨论中重新审视上面讨论的一些观点，届时我们将根据自己的分析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评论。也就是说，我们在这篇文章中的总体目标不是要对文献进行详细的批判，当然也不是要否认城市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相当大的经验差异，或者城市可以作为独特的案例进行有益的研究。相反，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试图建立一个关于城市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概念，我们认为这有助于为该领域内大量出现的争论带来一个共同的词汇表。任何这样的概念都将有助于对城市的调查，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促进这一关键任务的指针

的内在逻辑与其他社会进程划清界限。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理论方法实际上有助于照亮而不是歪曲个别城市和城市群的特殊性。至少城市研究文献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可以部分地追溯到研究者未能明确这些定义和分界的问题。

城市的历史渊源

所有的城市都是由密集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组成的，尽管对于在哪里以及如何划定一个较低的规模限制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即便如此，承认密度和集聚是城市的一般特征，也只能让我们在寻找城市化的解释或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方面走得更远。由于城市通常包含大量不同的经验现象，任何试图建立城市一般概念的努力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城市理论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将一系列复杂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掌握在手中。我们能否将所有的城市作为一类共同的现象归类？或者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成几个不同的、不可比拟的类别，在极端情况下，分成与单个城市一样多的类别？应对这些问题的最初步骤是确定城市化在不同时期和世界各地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似乎是可以进行第一轮理论描述的可能性。

城市化的早期历史形式

历史上，只有在可以提取粮食剩余的地方才会出现城市。一旦它们出现在地貌上，就会对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强烈的反馈效应（Jacobs, 1969）。此外，当农村的生产超过生存需求时，就会有一批非农业的剩余消费者得以维持。这个群体的成员经常拥有某种政治、军事、宗教和经济权力的组合，他们经常在地理空间上聚集在一起，形成城市或原生城市（Childe, 1950; Pirenne, 1952 [1925]; Bairoch, 1988; Braudel, 1995 [1949]）。即使在最早期的城市，政治管理、仪式和宗教追求、手工业生产（如奢侈品或军事硬件）和市场交易等活动的聚集几乎总是构成城市进程的核心（Wheatley, 1971）。聚集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像这些活动需要劳动分工和其他相互依存关系，表现为交易关系，其成本取决于距离，也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而获得功能上的协同效应。各种类型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巩固由此产生的动态集聚过程。换句话说，城市化的核心特征之一一直是其通过集聚而产生的效率。

最早的城市中心似乎是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在中东地区出现的。这些都是规模不大的定居点集群，如杰里科和比布鲁斯。公元前3500年左右，农业盈余不断增长，在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地中海沿岸和埃及以及印度的地理区域内形成了许多其他城市。正如Childe（1950）所描述的，伴随而来的社会组织和国家形成的革命反映在城市化上：密集的永久性定居点，包含非农业专家和纪念性的公共建筑，并表现出基于财富和权力差异的阶级关系（Smith, 2009）。世界上较先进的早期国家的后续城市化浪潮包括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古希腊迈锡尼和米诺斯城市、公元前2000-1500年期间的中国黄河沿岸城市、公元前700年左右的古罗马以及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中美洲城市。与这些发展相辅相成的是用于运送人员和货物的运输技术的进步。事实上，城市一直是长距离运输系统中的节点。

在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人口超过100万，在一个组织良好的贸易体系中作为中心节点，从欧洲北部延伸到地中海南部，并延伸到波斯（WardPerkins, 200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远距离的贸易活动经常导致各个城市中心明显的经济专业化（McCormick, 2001）。

如果说在1500年之前的5000年里，城市化在世界各个地区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那么城市的发展仍然普遍受到严重的制约。即使在城市化相对强劲的地区，它也没有以连续的、线性的方式前进，因为大多数城市都陷入了马尔萨斯的陷阱，而这个陷阱是由不确定的农业盈余引起的。然而，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探索时代，其中一些限制开始松动（Mann, 2011）。长途贸易成本开始急剧下降，这使得遥远的、通常是高度专业化的城市中心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尽管有这些发展，但直到18世纪末，主要是在西欧，马尔萨斯陷阱才被决定性地克服了。这一发展的关键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生产力水平的空前提高（Maddison, 2001; Bourguignon and Morrisson, 2002）。这不仅使生产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数量和种类的制成品成为可能，而且通过机械化的手段，克服了农业的限制和变化无常。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时代，城市化进程正式开始。在这个时代，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基本关系变得尤为明显。

- 工业化及其后果

十九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在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步伐加快，它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城市增长，最终形成了美国和西欧制造业地带的大型工业城市。十九世纪还见证了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资源加工、行政和贸易中心的发展，这些中心通常在殖民统治者的控制下。后来，特别是在20世纪中叶以后，发展中世界的一些城市在政府支持的工业化计划的支持下不断扩大。在二十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在制造业的基础上继续增长，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许多城市经历了一个非工业化时期，因为工作机会分散到低工资地区和国家，在许多情况下导致了核心地区的严重危机状况。在经历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的缓慢增长的过渡时期后，随着1980年代的到来，核心区的大城市再次经历了强劲的复苏。城市现在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新的“后福特主义”经济的焦点，其特点是决定性地从材料密集型制造业转向各种高科技、管理、物流、服务、设计和文化部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的加剧和新的国际分工的出现，也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大潮，许多城市现在都成为了重要的制造业出口生产地（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2）。最近，前“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城市（特别是香港、首尔、上海、新加坡、墨西哥城和圣保罗等非常大的城市）也开始摆脱制造业的工作，积极参与新的后福特主义经济（Scott, 2011）。

在过去的200年里，全世界的人口和城市都在持续增长，其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在当代，城市化已经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在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城市化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

在世界的先进地区和许多较不先进的地区，目前人类的城市化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然而，就目前而言，关键的一点是，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城市化从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发展、劳动分工、集聚、专业化和对外商业之间的复杂互动引起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城市最基本的**存在理由**，当然是在现代，在于它们作为经济生产和交换中心在更广泛的区域、国家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作用。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城市总是远远不止这些；然而，只有通过从经济活动的复杂空间动态分析开始，我们才能对所有城市共有的聚集动态作出解释。

聚集：生产、贸易和城市化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会通过集聚和专业化过程对城市增长产生强烈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国家城市化率（即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和人均GDP之间一贯的正向经验关系上（参见Renaud, 1979）。因此，经济扩张和城市化应该被正确理解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个递归的路径依赖关系中交织在一起，其关键链点集中在集聚过程。

关于集聚的技术性问题，现在大量的文献，因此在这里几乎不需要对这一主题进行预演，也许只需要指出，按照Duranton和Puga（2004）的说法，集聚一般可以理解为一种共享、匹配和学习的机制。共享是指生产系统内密集的地方性联系，以及使某些城市服务有必要作为公共产品供应的不可分割性。匹配指的是人与工作的配对过程，在当地存在大量公司和工人的情况下，这一过程会得到极大的促进。学习指的是密集的正式和非正式信息流（这往往会刺激创新），这些信息流通过集聚成为可能，并反过来加强集聚。综合来看，集聚的这些特性产生了强大的、可衡量的经济协同效应（另见Scott, 1988；Storper 1997；2013；Fujita and Thisse, 2002）。

这些观察结果与Amin和Thrift（2002：27）的说法背道而驰，他们认为城市“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近距离联系的地方”，“聚集、密度和近距离”没有产生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同上：53）。恰恰相反，城市现实的这些维度是各地城市的基本和决定性特征，即使是在一个城市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里。但是，作为过程和结果的集聚远远超出了经济地理学技术基础的狭窄问题，因为它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准普遍特征。集聚涉及到人类生活的许多社会、文化和政治/行政层面；因此，它不仅对经济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有强大的反馈作用。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集聚是将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人类活动的集合体的基本粘合剂，并且通过城市地区特有的公共资源和社会冲突，支撑着一个高度的

2 我们认识到，至少有一些后殖民主义城市理论家可能会认为这些言论等同于对城市进程的“发展主义”观点，在这种观点中，发达的现代主义西方以外的城市被视为（贬义的）仅以它们不是什么（即发达和现代）为特征。我们无意在此影射任何此类解释。

正如我们在后面所显示的那样，这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形式。此外，我们必须再次提醒大家，城市的经济功能深受外部贸易的影响。城市的发展和成长不仅仅是基于它们的内部关系；它们也被地理空间上的定位分类所塑造。贸易使城市能够实现专业化，并出售其产出以换取其他地方的专业化产出。因此，城市的经济活力和长距离贸易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现象。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中，资本和劳动力聚集的基本动态与人口、家庭、资本和公司的区域间分类相结合，导致了从国家到全球的各种规模的联系但专门的城市系统（Black and Henderson, 2003; Henderson and Venables, 2009）。

对集聚的强调直接指向了一个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因为如果集聚的概念有任何意义，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能够在地理空间中限定个别的集聚，当然，在有限的范围内，区分一个集聚与另一个集聚？鉴于Brenner（2013）的主张，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他认为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地球城市领域的时代，对任何坚持具体的地方规模的聚集提出了质疑。我们已经注意到，从古代开始，所有的城市都是作为密集的地方互动系统运作的，与人员、货物和信息的复杂的远距离流动相融合。鉴于这一观察，我们立即承认，城市在关系网络中彼此紧密地、日益地交织在一起。同样，在任何特定的城市和地理空间的其他部分之间不可能有僵硬和绝对的界限。然而，一旦提出这些观点，我们仍然需要确认城市的地位，它是整个空间经济中一个具体的、本地化的、标量的衔接，由于它的两极化、它的专门的土地使用、它相对密集的互动网络（包括它每天和每周的生活节奏），以及它不仅塑造经济过程（如土地、住房和劳动力价格的形成），而且塑造社会化动态、心理和文化。我们可以说，城市对于空间经济来说，就像一座山对于它所处的更广泛的地形一样。无论是城市还是山，都无法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将其与更广泛的环境分开，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强度和形式的某些差异使得将它们各自作为可分离的实体是合理和有实际意义的。此外，城市的特殊性并不取决于其内部和外部交易的粗略比例，而是取决于这两组交易的对比质量及其位置效应。事实上，城市内部交易通常与远距离交易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们往往具有单位距离的高成本和密集的隐性信息内容（因此经常需要面对面的接触），这些类型的人际交易是城市集聚的主要支柱之一（Storper和Venables, 2004；也见Scott, 2001）。

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全球化加剧，也有许多经验证据表明，城市规模的互动仍然非常活跃，实际上越来越多（Duranton和Storper, 2008）。Pred（1973）在研究美国城市化时指出，早在18世纪，当地的交易就有随着远距离贸易的增长而扩大的趋势。Hummels(2008)指出，目前的贸易绝大多数发生在纯粹的本地范围内，其他分析家如Charlot和Duranton(2006)、Reades(2010)以及Storper和Venables(2004)表明，本地面对面的互动和长途商务旅行作为彼此的补充而增长。同样地，本地化的科学互动与远距离的科学和知识交流同步增长（Zucker和Darby, 2006；Sonn和Storper, 2008）。更为关键的是，

至少到目前为止，全球化世界体系的兴起与城市的消亡无关，而是与所有五大洲的集聚/城市化进程的加剧有关。

城市土地关系

到此为止的讨论确定了城市化进程的一个主要方面，即植根于生产的空间集中以及集群和分类的多方面、循环和累积的动态。现在，我们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确定了一个相关的特征，这对任何关于城市性质的解释都是同样关键的。我们将这一特征称为*城市土地纽带*，意思是一组相互作用的土地使用，表达了城市的社会和经济活动浓缩为一个有区别的、两极化的、定位的马赛克的方式（Roweis和Scott，1978；Scott，1980）。换句话说，城市土地纽带与城市内部空间的基本结构相对应。这种现象作为聚集的广泛表现而出现，在现代社会中，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寻求生产地点的公司和寻求生活空间的家庭的行为所塑造。这些行为的形式通常是由市场机制产生的土地价格构成的，这些价格对用途进行仲裁，并维持独特的空间分配模式。此外，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企业和家庭）要求彼此接近，同时寻求避免他们可能经历负面溢出效应和其他对其活动的破坏性影响的地点。然而，这种活动的结果本质上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城市中任何一个点的空间供应都是非常缺乏弹性的，所以在进入和分离（或者说，接近和避免）方面的偏好几乎永远无法得到完全满足，这种困境由于支付能力的差异和作为城市土地关系的建筑形式的内在要素的位置僵化而被放大。

企业和家庭代表了城市土地关系的两个广泛划分的基本要素，可分别识别为工作和就业集中的城市生产空间，以及体现在住宅区的城市社会空间，通常由收入、种族和阶级等变量区分。此外，还可以发现第三个空间，即城市的流通空间，它由促进城市内部人员、货物和信息流动的基础设施和干线连接来代表。城市土地关系的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具有无穷无尽的经验多样性和相互渗透的特点，这反过来又引起了各个城市的高度特异性。然而，它们也可以在理论上被描述，因为它们的根源在于可普遍化的聚集/极化过程以及它们在整个城市空间中的功能整合。此外，尽管城市的大部分内部空间被划分为可以单独拥有和交换的土地单位，但城市土地关系远远超出了独立的私人地点的简单集合。城市土地的单位--在城市内部空间的单个地点的意义上，以及整个街区或地区，由基础设施提供服务，并具有因接近和分离其他土地使用而形成的特征--反映了许多个人、社区和政治行动，这些行动总是影响着它们。这句话包括但超越了一个标准的概念，即私人土地使用产生外部效应，或其生产是面对市场失效的公共干预的结果。城市土地的基本性质是，它同时是私人 and 公共的，个人和集体的，它的形状和形式表达了公司和家庭的个人行动和各种控制和治理机构的集体行动的相互交织的动态。

作为一个推论，城市土地关系是广泛的公共资产和负债的场所，这一点意味着，在缺乏有效的集体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它受到许多种功能失调的影响，从基础设施故障到位置冲突，从恶化的街区到环境污染。如果没有能够实施相关规划和政策措施的机构，这些功能失调无疑会破坏城市的生存能力，因为单靠市场逻辑是先天性的，不能为了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而对城市公地进行管理。因此，非市场的集体行动机构通常会出现，以保持城市土地关系的某种可运作的秩序。有时这些机构是纯粹的地方性机构，有时它们存在于整个治理结构的更高层次。例如，土地使用的监管大多（但不一定完全）由地方机构发起，包括正式的政府机构和各种民间协会。相比之下，对交通建设项目的财政支持往往是由更高层次的机构提供。同时，城市和超城市的集体行动机构经常参与干预城市中存在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与城市土地关系只有间接关系。这种干预的例子可能包括对医院行政安排的监管或机场安全规则的制定。此外，在后一种情况下，地方集体经常充当向城市选民转达更高一级任务的机构。由于在城市政府机构中可以发现这些不同的交叉潮流，我们可以说后者扮演了一个混合的角色，一个是纯粹的地方角色（和城市土地关系动态的内在因素），一个是由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压力驱动的角色。关于城市政府的目的和职能的普遍困惑（如 Cochrane, 2006年所表达的），很可能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没有认识到治理领域中规模和职能的这种基本的相互渗透。

城市的范围和限制

这种大量的城市关系现在必须被置于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但是，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从而失去城市的独特性。在目前的历史时刻，城市化进程被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财产关系深刻地塑造着，尽管它们不能被简化为这些关系的功能主义表达，因为它们也被思想、利益和政治所塑造。因此，今天的城市为大多数经济体系的运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并不自动以任何最佳方式履行这一角色。相反，城市经常产生对更广泛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安排的可行性有负面影响的条件。

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是接续上一节的论点，坚持区分在城市中发现的但不具有内在城市特征的问题和这里确定的严格意义上的城市问题，即它们围绕着城市土地关系中的集聚和极化过程以及相关互动。例如，城市中通常有许多穷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贫困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城市的特点，也不意味着贫困主要是由城市化造成的（Slater, 2013）。贫困主要是在一系列与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就业机会的结构以及教育和培训的可用性相关的宏观社会进程中产生的。尽管如此，某些城市条件无疑会加剧或改善贫困水平，例如，在集中的邻里问题，如普遍存在的

帮派文化，影响儿童的教育表现水平（Sampson，2012）。对这些具体城市问题的政策关注可能会对整体贫困率产生调整，但它们不会一劳永逸地消除贫困。美国在21世纪头十年的住房繁荣和萧条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说明城市问题和城市问题之间的分析差异。次级房地产的繁荣主要不是由城市化引起的，而是由金融业的一些创新引起的，这些创新与向高风险家庭提供抵押贷款有关。随之而来的过量资本供应在房地产部门产生了资产价格泡沫，当该部门的投资回报率崩溃时，房地产价值的螺旋式下降和住房的放弃就出现了。因此，一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城市的危机，后来被转化为具体的城市术语，表现为不断恶化的街区和相关的负外部性链条。这些标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确定城市作为一个分析领域，特别是至少从目前困扰城市研究领域的折衷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目标的失败）中挽救它的一些基本特征。

城市分析中的通用性和差异性

城市总是被嵌入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体系中，在许多不同的尺度上。这些背景情况使各个城市中心具有不同的特征，并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产生了许多形式和功能的变化。因此，有些城市已经进入后工业阶段，有些则以制造业就业为主；有些位于相对繁荣的国家，有些则位于贫困猖獗的国家；有些位于种族和民族构成相对单一的社会中，有些则位于在这些方面具有巨大多样性的社会；有的被专制的社会和政治框架所覆盖，有的被更开放和民主的关系所覆盖；有的在全球的北方，有的在全球的南方；等等，几乎无穷无尽。我们可能会问，由于这些不同的背景情况，城市的经验构成显然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是否证明了城市有多种不同的概念？或者说，我们能不能穿过这个死结，揭示出一个连贯的城市概念，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

我们坚持认为，城市化进程的本质在于城市作为生产活动和人类生活的集群的双重地位，然后展开为密集的、内部变化的、相互作用的土地使用、地点和相关制度/政治安排的网路。即便如此，不考虑城市之间存在的经验差异或忽视塑造特定城市个性的背景变量将是一个重大错误。五个这样的变量似乎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否定城市化作为空间整合和互动的特殊模式的一般性质。它们对城市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可以总结如下：

- 1 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有很大的差异。同时，处于不同发展背景下的城市在经济基础、基础设施禀赋以及富人、穷人和中等收入人群的补充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反差。
- 2 管理资源分配的规则对城市发展有重大影响。一个通过市场分配资源的社会与一个通过非市场规则或通过某种混合安排（如市场系统与强有力的城市规划法规相结合）处理资源分配的社会通常会有不同的做法。

- 3 盛行的社会分层结构，包括种族和民族差异，对邻里关系的形成有强大的影响。
- 4 差异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来自于文化规范和传统。这些影响到许多影响城市景观的做法和生活方式，包括社区的形成、演变和持续，以及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运作。
- 5 政治权威和权力的总体条件在任何特定社会的城市发展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些条件通常界定了地方政府和城市规划活动的范围，从而影响了城市土地关系的详细空间运作，正如它们几乎总是对地方政治竞争的动态产生强烈影响一样。

关于这最后一点，政治权威和权力的广泛条件往往以中介的形式在个别城市的天际线上显示出来，例如在伦敦和巴黎可以观察到的帝国纪念碑的残余，继续笼罩莫斯科的苏联巨人主义，从曼谷到北京的亚洲城市中大量存在的封建遗迹，以及拉丁美洲许多地方的城市的殖民残余。

鉴于城市中发生的经验现象的特殊性，以及上文列举的背景变量使不可减少的多样性的感觉变得更加复杂，城市总是在第一时间呈现出一种令人困惑的个性程度。因此，如此多的分析家倾向于将每个城市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并坚持认为概念抽象是徒劳的和危险的，这一点并不奇怪。我们可以把随之而来的城市分析风格称为“新的特殊主义”，尽管我们急忙补充说，有不同的概念路径进入这一调查脉络。如前所述，在目前流行的城市分析方法中，可以发现这样一条途径，即集合理论和行为网络理论。在城市研究的实际应用中，这些方法倾向于通过关注离散突发事件的万花筒式组合的描述，而忽略了经常性的基本结构和过程，从而给人以城市单一性的激进印象。在我们看来，目前被一些地理学家所青睐的比较方法也默认了城市结果的特殊性，尽管Robinson（2011）声称其理论生成能力。事实上，有意义的比较工作要求我们在开始比较之前，对分析单位的意义和属性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意识。在缺乏这种感觉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准则来确定什么是适当的比较点，或者说，这些比较点究竟是什么，需要进行比较调查。我们在这里的论点并不是说经验性的特殊性本质上是无趣的或无价值的，远非如此。相反，我们提出了一个明显的、老生常谈的观点，即在任何科学努力中，概念的抽象化实际上有助于研究者揭示基本观察数据中的有意义的差异水平，就像它是构建有用的经验分类法的一个重要前提。例如，在一个分析层面上，巴黎的棕色和黑色郊区与洛杉矶中南部的种族和民族特色社区或加拉加斯的贫民区有着明显的不同。同样，伦敦的上层社区与东京的上层社区在质地上有很大不同，就像这两个案例与里约热内卢的Gávea或São Conrado的特权社区完全不同。然而，在这些例子之间明显的经验差异之下（注意，“邻里”和“社区”这两个词已经与理论含义产生了共鸣），我们遇到了广泛观察到的社会隔离机制，这些机制是由土地和住房市场与种族、阶级和民族的激动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地，对任何个体的问题和困境的精确政策反应也是如此。

城市发展的实例必然会彼此不同，但同样，其方式几乎总是与城市土地关系的动态有关，其一般形式的崩溃和集体混乱与负面的溢出效应、过热的增长或长期的经济衰退、就业和住房的不平衡、废弃的财产、拥挤、污染、恶化的基础设施、获得城市空间和公共产品的冲突、社会功能失调的街区、无序扩张和所有其他。

当然，特殊性往往是学术工作的一个积极属性。它是批判性经验细节和描述性色彩的来源，它无疑是许多后殖民主义城市分析方法的倡导者所进行的丰富的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非常恰当的层面。然而，在这些方法中，故意鼓吹城市生活的“混乱”--如Simone（2004：408）将城市状况描述为“物体、空间、人和实践的复杂组合”--表面上是正确的，但根本上是不完整的，因为正如我们所论证的，城市生活中存在着系统的规律性，容易受到高水平的理论概括。同时，在后殖民时期的城市文献中，存在着一种模糊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特殊主义，另一方面是对理论建构和重建的渴望。在这些文献中，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南方的城市否定了迄今为止的城市理论，Roy（2009：820）引用了这一概念作为她的声明的基础，即现在是“开放理论地理学”的时候。在学术工作中，谨慎行事的原则始终是值得鼓励的，但同样地，不能仅仅以现有的地理学是在有限的“城市剧目”上发现的，排除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经验性变化为理由，来证明彻底的破坏性。我们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对全球南方城市的研究可能需要对城市理论进行彻底的重构，但这种重构不会仅仅来自于这些城市表现出与全球北方城市表面上的经验差异（或者，事实上，相互之间的差异）。相反，它将来来自于对全球南方城市化的研究可能提供的关于城市集聚过程的逻辑和内部运作以及我们目前所理解的城市土地关系的相关动态的任何新的和迄今未被预见的见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补充说，对“世界性”（Robinson，2006）和强调城市的“世界性”（Roy，2011b）的新型城市分析的呼吁，本质上是一种姿态性的，因为它缺乏对城市化的起源和基本特征的具体了解，而城市化是一个由密集的两极化和互动空间构成的城市土地关系的基础系统。罗宾逊（2011：13）说，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集合、多元和连接的场所”，这句话几乎完全是不确定的，（就像上面引用的西蒙尼的话）显然没有把城市作为一个独特的、具体的社会现象，从广大的历史和地理现实中区分出来。

对城市研究和政策的影响

我们在前面说过，一个可行的城市理论应该使我们能够区分那些本质上属于城市的社会生活动力和那些更适合被看作是在严格的城市范围之外的社会生活动力，即使它们可以作为一个在城市中发生的经验问题被发现。这项任务并不容易，但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为任何处理这项任务的尝试提供了一些标准。

我们的方法强调了所有类型的城市的共同点以及形成这些城市的组织过程。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防止过度的冲动，将某些戏剧性的或特殊的城市实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方法就像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需要重新制定理论（Roy，2011年a；与Boo，2011年相比），因为金沙萨破败的基础设施和暴力，孟买广泛的贫民窟或目前南欧城市的金融崩溃。此外--这肯定是其力量的重要部分--我们的方法削弱了另一种毫无根据的诱惑（在Dick和Rimmer，1998年中突出显示），即全世界的城市都在向一个共同的经验模板靠拢。顺便说一下，这些命题都不是为了证明或促进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出现的任何城市理论。多年来，许多有缺陷的理论被制定出来，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例子，在一个城市背景下开发的想法被不适当地应用到其他地方。正如Robinson（2006）所言，这种误用的一个突出例子是20世纪中期试图通过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来解释赞比亚铜带地区的城市生活。

这些问题直接蔓延到对城市理论和政策干预之间关系的任何考虑。城市政策文献已经就这一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辩论，针对特定城市或城市部分地区的“地点政策”和针对特定社会经济类别而不考虑地点的“人的政策”进行了区分（Glickman, 1981; Glaeser and Gyourko, 2005; Freedman, 2012）。特别是城市贫困分析家，对这种区别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在确定以地点为重点的政策（如寻求缓和穷人在某些街区的空间集中或隔离的干预措施）与以人为重点的政策（如旨在纠正家庭破裂或教育失败等因素的干预措施）的潜力和限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里的问题远非一锤定音，随着研究对城市和贫困及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不断发展，辩论仍然是开放的。关于城市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效力，文献中也有许多明显夸大的说法。例如，目前有大量文献认为城市是解放性政治趋势和运动的主要源泉（如Soja, 2010; Harvey, 2012）。城市的作用毋庸置疑，正是因为其规模和密度，它是政治辩论的中心，也是民众抗议和政治动员的爆发点，这些问题必须在任何一般的城市理论中占据突出地位；具体的城市冲突也必须如此，比如在城市中获得集体消费的项目，或者在社区发展的公共支出中存在不公平的差异。然而，当代社会中政治争论的基本病因远远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城市领域，因为它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核心，不公正、不平等、政治压迫的基本机制和其他不平等和动荡的主要原因都在这里。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目前普遍存在的、倾向于将所有形式的社会和政治行动同化为城市整体的主张定性为严重的概念过度（参见Cox, 2001; Purcell, 2006）。即使在21世纪，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部分人类存在在地理上被包含在城市中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甚至大部分的存在--以Lefebvre的步伐--都可以被描述为在我们上述的意义上是内在的城市。

Allen J. Scott,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CLA, 1255 Bunche Hall, Los Angeles, CA 90095-1524, USA, ajscott@ucla.edu

Michael Storper，伦敦经济学院地理与环境系，Houghton Street, London WC2A 2AE, UK, m.storper@lse.ac.uk

3 我们可以补充说，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甚至在应用于芝加哥时也存在严重的缺陷。

参考文献

- Abu-Lughod, J. (1965) Tale of two cities: the origins of modern Cairo. *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 7.4, 429-57。
- Amin, A. and S. Graham (1997) The ordinary city. *英国地理学家协会期刊*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2.4, 411-29。
- Amin, A. and N. Thrift (2002) *Cities: reimagining the urban*. Polity, Cambridge.
- Bairoch, P. (1988) *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芝加哥。
- Black, D. and J.V. Henderson (2003) Urban evolution in the USA. *经济地理学杂志* 3.4, 343-72。
- Boo, K. (2011) *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 Life, death and hope in a Mumbai undercity*. 兰登书屋, 纽约。
- Bourguignon, F. and C. Morrisson (2002) 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1992. *美国经济评论* 92.4, 727-44。
- Braudel, F. (1995 [1949])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加州大学出版社, 伯克利和洛杉矶。
- Brenner, N. (1999) Globalisation as reterritorialis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城市研究* 36.3, 431-51。
- Brenner, N. (2013) Theses on urbanization. *公共文化* 25.1, 85-114。
- Castells, M. (1968) Y a-t-il une sociologie urbaine? *工作社会学* 1.1, 72-90。
- Castells, M. (1972) *La question urbaine*. Maspero, Paris.
- Charlot, S. and G. Duranton (2006) Cities and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some quantitative French evidence. *城市研究* 43.8, 1365-94。
- Childe, V.G. (1950) The urban revolution. *城市规划评论* 21.1, 3-17。
- Cochrane, A. (2006) *Understanding urban polic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lackwell, Oxford.
- Cox, K.R. (2001) Territoriality, politics and the urban. *Political Geography* 20.6, 745-62。
- Dick, H.W. and P.J. Rimmer (1998) Beyond the third world city: the new urban 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城市研究* 35.12, 2303-21。
- Duranton, G. and D. Puga (2004)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J.V. Henderson and J.-F. Thisse (eds). Thisse (eds.),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Elsevier, Amsterdam.
- Duranton, G. and M. Storper (2008) Rising trade costs? 有内生交易成本的集聚和贸易.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1.1, 292-319。
- Farias, I. and T. Bender (eds.) (2010) *Urban assemblages: how actor-network theory changes urban studies*. Routledge, 伦敦。
- Freedman, M. (2012) Place-based programs and the geographic dispersion of unemployment. 工作文件, 康奈尔大学经济系, 纽约州伊萨卡。
- Friedmann, J. and G. Wolff (1982)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6.3, 309-44。
- Fujita, M. and J.-F. Thisse (2002). Thisse (2002)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cities,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剑桥大学出版社, 剑桥。
- Glaeser, E.L. and J. Gyourko (2005) Urban decline and durable housing. *政治经济学杂志* 113.2, 345-76。
- Glickman, N.J. (1981) 在缓慢增长的经济中出现的城市政策: 保守的倡议和美国的渐进式反应. *国际城市和区域研究杂志* 5.4, 492-528。
- Harvey, D.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Edward Arnold, 伦敦。
- Harvey, D. (2007)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牛津大学出版社, 牛津。
- Harvey, D. (2012)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Verso, 伦敦。
- Henderson, J.V. (2010) Cities and development. *区域科学杂志* 50.1, 515-40。

- Henderson, J.V. and A.J. Venables (2009) Dynamics of city form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2.2, 233-54.
- Hummels, D. (2008) 运输成本和第二个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贸易。《经济展望杂志》21.3, 131-54。
- Jackson, P. (1989) Geography, race and racism. 在 R. Peet 和 N. Thrift (编辑), *地理学的新模式*, 第二卷, Unwin Hyman, 伦敦。
- Jacobs, J. (1969) *The economy of cities*. Vintage, New York.
- Jacobs, J. (1998) *The edge of empire: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ity*. Routledge, 伦敦。
- Jessop, B. (1997) The entrepreneurial city: re-imaging localities, redesigning economic governance, or restructuring capital? In N. Jewson and S. MacGregor (eds.), *Transforming cities: contested governance and new spatial divisions*, Routledge, London.
- King, A.D. (1976) *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culture, social power and environment*.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伦敦。
- Lefebvre, H. (1970)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巴黎。
- Maddison, A.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发展中心, 巴黎。
- Mann, C.C. (2011) *1493: 揭开哥伦布创造的新世界*. Vintage, New York.
- Massey, D. (1991) Flexible sexism. *环境与规划 D: 社会 and 空间* 9.1, 31-57。
- McCormick, M. (2001)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Communication and Commerce AD 300-900*. 剑桥大学出版社, 纽约。
- McDowell, L. (1983)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der division of urban space. *环境与规划 D: 社会 and 空间* 1.1, 59-72。
- McFarlane, C. (2010) The comparative city: knowledge, learning, urba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4.4, 725-42.
- McFarlane, C. (2011) Assemblage and critical urban praxis. *城市* 15.3/4, 204-24。
-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2) 《城市世界: 城市 and 消费阶层的崛起》[WWW 文件]。URL 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urbanization/urban_world_cities_and_the_rise_the_consuming_class (2014 年 2 月 21 日访问)。
- Ong, A. and S.J. Collier (2004) *Global assemblages: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Wiley-Blackwell, 伦敦。
- Park, R.E., E.W. Burgess and R.D. McKenzie (1925) *The city*.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芝加哥。
- Perec, G. (1974) *Espèces d'espaces*. Galilée, Paris.
- Pirenne, H. (1952 [1925]) *Medieval cities: the origins and revival of trade*.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普林斯顿, 新泽西。
- Pred, A.R. (1973) *Urban growth and the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the US urban system, 1790-1840*. 哈佛大学出版社, 剑桥, MA。
- Purcell, M. (2006) Urban democracy and the local trap. *城市研究* 43.11, 1921-41。
- Rankin, K.N. (2011) Assemblage and the politics of thick description. *城市* 15.5, 563-69。
- Reades, J. (2010) The pla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spatial decision by firms in the ag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伦敦大学学院城乡规划系巴特利特学院。
- Renaud, B. (1979) *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城市化政策*. 世界银行, 华盛顿特区。
- Robinson, J. (2004) In the tracks of comparative urbanism: difference, urban modernity and the primitive. *城市地理学* 25.8, 709-23。
- Robinson, J. (2006) *The ordinary city: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Routledge, 伦敦。
- Robinson, J. (2011) Cities in a world of cities: the comparative ges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5.1, 1-23.
- Roweis, S.T. and A.J. Scott (1978) The urban land question. In K. Cox (ed.), *Urbanization and conflict in market societies*, Maaroufa, Chicago。

- Roy, A. (2009) The 21st-century metropolis: new geographies of theory. *区域研究* 43.6, 819-30.
- Roy, A. (2011a) Slumdog cities: rethinking subaltern urba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5.2, 223-38.
- Roy, A. (2011b) Urbanisms, worlding practices and the theory of planning. *规划理论* 10.1, 6-15.
- Roy, A. and A. Ong (2011) *Worlding cities*. Wiley Blackwell, 伦敦。
- Sampson, R. (2012) *The great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芝加哥。
-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 New York, London, Tokyo*.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普林斯顿。
- Sassen, S. (2008)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普林斯顿, 新泽西。
- Saunders, P. (1981)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Hutchinson, 伦敦。
- Scott, A.J. (1980) *The urban land nexus and the state*. Pion, 伦敦。
- Scott, A.J. (1988) *Metropolis: From the division of labor to urban form*. 加州大学出版社, 伯克利。
- Scott, A.J. (2001)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ity-regions. *欧洲规划研究* 9.7, 813-26.
- Scott, A.J. (2011) Emerging cities of the third wave. *城市* 15.3/4, 289-381.
- Simone, A. (2004)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intersecting fragments in Johannesburg. *公共文化* 16.3, 407-29。
- Slater, T. (2013) Your life chances affect where you live: a critique of the 'cottage industry' of neighbourhood effect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7.2, 367-87.
- Smith, M.E. (2009) V. Gordon Childe and the urban revolution: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a revolution in urban studies. *Town Planning Review* 80.1, 3-29.
- Soja, E. (2010)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明尼阿波利斯。
- Sonn, J.W. and M. Storper (2008)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geographical proximity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 analysis of U.S. patent citations, 1975-1997. *环境与规划A* 40.5, 1020-39.
- Storper, M. (1997)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Guilford Press, New York.
- Storper, M. (2013) *Keys to the city: how economics, institutions, interactions and politics shape development*.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普林斯顿, 新泽西。
- Storper, M. and A.J. Venables (2004) Buzz: face-to-face contact and the urban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4.4, 351-70.
- Wachsmuth, D., D.J. Madden and N. Brenner (2011) Between abstraction and complexity: meta-theore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assemblage debate. *城市* 15.6, 740-50。
- Waldinger, R. and M. Bozorgmehr (eds.) (1996) *Ethnic Los Angele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
- Ward-Perkins, B. (2005)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sation*. 牛津大学出版社, 牛津。
- Wheatley, P. (1971)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阿尔丁, 芝加哥。
- Wirth, L.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美国社会学杂志* 44.1, 1-24。
- 世界银行 (2009) 《世界发展报告: 重塑经济地理》。世界银行, 华盛顿特区。
- Zorbaugh, H.W. (1929) *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cago's Near North Side*.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芝加哥。
- Zucker, L.G. and M.R. Darby (2006) 明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流动与高科技公司的进入。工作文件12172, 国家经济研究局, 剑桥, 马萨诸塞州。